

目 录

从汉冶萍公司到大冶钢厂	宋锦西编写 (1)
我参加中国驻印军的一段经历	朱和甫 (12)
铜乡春正浓	朱殿有 (33)
谈谈《金牛帮》	金南谷 (42)
黄石历史沿革	朱开化编写 (47)
前 言	(47)
地理概况	(54)
历史沿革	(58)
主要战例	(92)
名胜古迹	(99)

从汉冶萍公司到大冶钢厂

宋锦西编写

扬名中外的汉冶萍公司，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在中国近代工业史上占据很重要的地位。它以官僚买办资本代替古老的民族资本，以现代大工业代替封建工场手工业，使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更加典型化，资本主义化。

汉冶萍公司经历了兴起、演变、挣扎、崩溃的过程。这个显赫一时的庞大企业，最后不得不随着反动腐朽的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的土崩瓦解而谢世。社会主义的大冶钢厂和一个接着一个的现代化大企业，如雨后春笋，勃勃兴起，从而代替了汉冶萍公司的时代。

1889年十一月，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募来比、英、德等国矿师前往大冶各地履勘，进一步了解到“大冶铁山系产旺质良、取用不竭”，“唐宋以来，屡经开采鼓铸”（见《张文襄公全集》96卷，40页）的富足矿源。1890年春，湖北铁政局在武昌水陆街开设。同年三月，张之洞又在大冶铁山铺设立矿务局，委派林佐、李增荣为总办，进行购地事宜。

有了铁矿，建设炼铁厂就成了当务之急。经过劳奔日

久，湖北炼铁厂终于在汉阳龟山脚下定基。1890年十月，张之洞委派张鹏飞督办从铁山至黄石港江边的运矿大马路。后因马车运矿不能满足需要，就改修一条六十华里的铁路，1892年九月竣工通车。1893年秋，年产三万吨矿石的大冶铁矿正式建成投产。1894年六月三十日，汉阳铁厂也投产开炼。同时，为铁矿服务的大冶铁矿运道处石灰窑修理厂，也逾期建成。这就是大冶钢厂最早的名称，即现在大冶钢厂的机械厂。当时规模很小，只有一百零三个工人。

从1890年至1896年，清朝政府把从民众那里搜刮来的5,687,614两库银，投进了湖北铁政局。在封建官僚的主持下，经营管理极端腐败，汉冶厂矿成了封建衙门的变态，不但不能兴业，而且不能自养。1896年四月初，张之洞见势不妙，便委任直隶海关道员盛宣怀为汉冶厂矿的督办。从此，“官办时期”宣告结束，进入了“官督商办”买办经营时期。

1898年三月，盛宣怀奏准清廷，取得了开采萍乡安源煤矿的权利，决定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合并。1908年二月二十四日，汉冶萍煤铁厂矿股份有限公司获准注册，正式成立。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盛宣怀企图发战争财，扩大自己垄断资本的势力，提出了一个庞大的扩建计划。打算在石灰窑修理厂的基础上，建一座拥有八个450立方米高炉的大型炼铁厂。据日本天皇的特使西泽公雄说：“汉阳在冬季时大船不能往返，反之，新厂在全年内大船都可交通。”（见西泽公雄《关于大冶新厂意见书》）。可见，帝国主义经济掠夺的触角，

这时已经伸到了汉冶萍公司。

盛宣怀的如意算盘打定之后，1915年初便开始筹款，在石灰窑至袁家湖一带购地勘基，共圈夺农民的土地4186亩。1916年初，大冶铁厂正式成立，由汉阳铁厂厂长吴健兼任大冶铁厂第一任厂长。公司授聘的日籍工程技术顾问大岛道太郎，为该厂建设时期总工程师，负责设计和监造施工。

1916年四月二十七日盛宣怀在上海病死，由五子盛重颐继承父业。不久，四子盛恩颐从国外留学回来，取代了盛重颐的权利。改命李维格为厂长，吴健为副厂长。由于扩建经费主要来源日本借款，诸事均受日本人支配，各级管理人员多怠慢职守，营私舞弊，贪污浪费严重。原定1918年成就大业，结果工程期限一再延误，到1918年才使两座高炉破土筑基。

大冶铁厂第一次预算为4,332,000两例银，占公司扩建总预算的53.3%。1918年又追加经费1,479,000两例银，使预算比例上升到58.2%。虽然如此，仍无能为役，只得将八座高炉的建设计划改作两座。1923年三月二十七日开一号炉，就遇装料吊车链条被拉断的麻烦。六月二十四日重新开炼，又发生炉盖链条拉断事故，抢修到六月二十六日才出第一炉铁。七月五日因炉盖升关不灵，被迫停炉。1924年四月四日开二号炉，也是事故不断，八月三十日穿炉漏铁，引起炉体炸裂。这座高炉象患了疟疾似的，冷热不定，到年底也熄了火。1925年五月再度开一号炉，因经费不济，原料供不应求，挣扎开炼到十月十八日，只得倒团结业。实际开工率不到生产能力的一半，共出生铁

257,000多吨，生产耗费达900余万银元。

1924年，大冶铁厂与大冶铁矿合并，称大冶厂矿，由季厚璽任厂矿长，吴键任副厂矿长。统管铁山、下陆、石灰窑、袁家湖各处矿山、码头、工场的生产事务。工人最多达四千有余，其中大冶铁厂约有工人一千多。

两座高炉自1925年停产以后，盛氏集团和日本帝国主义者，一直没有放弃恢复生产的念头。1926年十月，北伐军胜利到达大冶地区，厂矿当局为了抵制北伐，一面公开裁减工人，停止矿石的采运，一面由厂矿长偷偷地和日本人达成协议，谋划复工，秘密作扩充矿位的工程准备。1936年底，日本帝国主义者出于侵略扩张的需要，念念不忘掠夺大冶的经济资源。他们企图通过主宰公司的日籍会计顾问吉川雄辅，积极进行重新恢复高炉生产的活动。1937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传来了抗日的炮声，在大冶厂矿的日籍人员一下子都跑个精光。总经理盛恩颐也下令所属厂矿都停止生产。因此，恢复大冶铁厂高炉生产的计划也就告吹了。

1938年三月，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和兵工署，在武汉联合成立了一个“钢铁厂迁建委员会”，准备把汉冶厂矿的重要设备运至四川大渡口。还在大冶石灰窑设了一个保管处，由汪志翔任处长，少数保管人员留守，其余员工一律遣散。九月，汪志翔将厂矿的全部文卷、图纸、仪器和资财，悉数运到汉口存放，派管维屏为大冶厂矿驻汉保管员。汪志翔一伙头目，却往重庆逃之夭夭。“迁建委员会”拆走的主要设备有高炉鼓风机两台，500 马力柴油机两台，1500瓩交流透平发电机两台，铁轨五、六公里。

有许多机件、铁轨和设备，因装运不及，都扔进了长江。随后，又由武汉卫戍司令部派来的爆破队，把厂房、炉基以及来不及拆除的机器设备全部炸毁。

1938年十月八日，日本侵略军分作两路占夺了大冶、黄（石港）石（灰窑）地区。原来撤离的日籍工程技术人员，其实并没有回国，他们都待在长江口外的日本军舰上，窥伺时机，卷土重来。果然，他们都佩戴着“日本海军陆战队嘱托”的袖标，昂头甩肩，威风凛凛地重返到了大冶厂矿，依然又住进了他们饱食终日，灯红酒绿的小洋楼。

早在头一年八月，日本人就和盛恩颐密谋大冶厂矿的复业计划。十一月，日本内阁便正式决定，把大冶厂矿委托给日本制铁株式会社经管。不久，又在石灰窑成立“大冶矿业所”，全面霸占了大冶厂矿。接着，他们以最快的速度招回许多老工人，日夜填土铺路，抢修设备。1939年四月三日，铁山至石灰窑一线27公里铁路修复通车。十月，矿山恢复了生产。

大冶铁厂这时已经变成了专门为矿山服务的“日铁修配厂”，设有木模、铸造、机修、铁路车辆修理、汽车修理、冷作焊接、钢件及管子加工、制冰、制氧、装置等工场。原有的水厂也已修复。虽然没有炼铁，其规模比商办时期的大冶铁厂要大得多，工人数达2,000余人。

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长期侵占我国，认为把矿石运往本土，不如在中国就地炼成钢铁划算。于是，他们着手把铁厂的两座残存的高炉设备拆往石景山，企图大举扩充北方的钢铁基地，便于近取军事原料。1940年开始拆迁一号

炉，运至途中，却遭飞机炸毁。因此，拆迁二号炉的计划只得放弃了。

1945年九月日本侵略者投降以后，国民党经济部马上指示湘鄂赣区特派员李景澄，委派代表朱若萍接收了大冶矿业所，成立了“日铁保管处”。1946年二月，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又派刘刚接管了“日铁保管处”，成立了“大冶厂矿保管处”。同年七月，又将该“保管处”改为“华中钢铁公司筹备处”，程义法任主任，刘刚任副主任。1948年七月，“华中钢铁公司”正式宣告成立，副总经理张松龄代总经理，刘刚和邱玉池任协理员。这个公司不仅包揽了汉阳铁厂的财产，而且还吞并了大冶象鼻山铁矿。它实际上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垄断华中地区钢铁工业的重要基地。

国民党接受了大冶厂矿以后，竭力摆出了一付雄心勃勃的办钢铁工业的架势，曾先后拟了三个建设“华钢”的计划。1946年，由资源委员会委托美国麦基专业设计公司，搞了一个年产百万吨钢铁的宏伟计划，打算分两期共十年建成，工程预算达三亿多银元。后来美国垄断资本主义者忙于军事上抢救蒋介石，支持其发动内战，顾不得对中国工业的规划，使这第一个计划成了纸上谈兵。1947年，国民党当局又拟订了一个年产15万吨钢锭的计划，限期三年建成。结果又在内战的冲击下破了产。1948年，他们又打算利用残存的设备，稍作拼凑补充，设立一座年产三千六百吨的电炉，以生产钢条、钢丝、鱼尾板、螺丝、道钉、元钉、铸钢件为主的小型五金工厂，限期一年投产。到1949年五月解放的前夕，只搞成一座83m³高炉，二

座1.5吨转炉，一座8吨电炉，250mm和430mm轧机各一台，都未正式投入生产。

华中钢铁公司的牌头很大，机构也很庞杂，实质上是个徒有虚名的空架子，工人还不到千名，不出铁也不出钢。只见“烟囱麻雀做窝，厂房野兔出没，杂草掩着断壁，一片萧条冷落。”

汉冶萍公司虽然是中国空前庞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可是汉冶萍的工人却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剥削，长期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那种残酷压榨的程度，也是世界罕见的。他们在大冶铁厂所采用的剥削手段主要有：收买廉价劳动力；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压低和克扣工人工资；大量使用童工等等。

为了建厂，官僚买办们夺走了农民的大量土地，致使大批农民破产，没有生产资料，只有靠出卖劳动力生活。当时工厂、矿山需要的工人量少，找工做的失业者很多，劳动力市场的竞争非常激烈。吴键曾经说：“一百条狗子难找，一百个工人好找。”可见要想进厂做工是多么的不容易。因此，每个想进厂做工的人，都必须求人托保，请客送礼。大冶铁厂为了取得廉价的高效劳动力，实行了严格的考工制度。每个应考的工人都要扛上重物，从西总门内走到游艺场（现厂俱乐部门前），三百多米远，用马表计时，中途不能停歇。许多工人被压伤，甚至当场吐血，致残终身。厂方用这种办法不断地招进身强力壮的工人，另一方面又用解雇的办法清除老弱病残的工人。1924年大冶铁厂共解雇工人1122个，1947年共解雇5000多名工人，使大批工人陷入失业的苦难中挣扎。当时有一首歌谣说：

“少年进厂把嘴混，老弱病残赶出门，逃荒讨米路头翻，一把骨头遗山林。”

大冶铁厂工人的劳动是雇佣制，主要有月工、点工和包工三种。其中80%以上是包工，就是由工头招募一批工人与厂方签订合同，讲好工程期限、工作量和包价。按时按量完成承包，厂方给奖，归工头所得。不能按时完成定额就罚款，由工人承担。工人本来工资很低，都害怕罚款，不得不用延长劳动时间来争取完成定额。官办时期工人每天要作12到14小时的繁重劳动，没有星期天。商办时期工人的劳动时间不变，每月初一和十五日休息，不上班没有工资。日本侵占时期工人每天要干12至16小时，跟奴隶没有什么区别。

由于劳动时间长、强度大，劳动条件十分恶劣，铁厂里的人身设备事故严重。1921年七月，水塔脱底，当场砸死六名工人。出事故死的工人，没有安葬费和抚恤费，用芦席一卷，拖往黄荆山的坡上，埋在土坑里。

工人受的奴隶苦，干的牛马活，拿的工资不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商办时期一个高级技工，每月工资约40~80银元。这种工人全厂当时只有五、六个。一般技工每月工资只有8~30元。占80%以上的普通工人，每月工资约四吊半到十二吊铜钱。这样微薄的工资，工人还不能足数拿到手，还要被“明吃暗抽，撩头切尾”、“吃空额”、

“中间吃黑”、“拖欠工资”等手段进行层层盘剥克扣。致使工人生活毫无保障，经常吃的霉米粥、苞谷心、苕藤和野菜。穿的麻袋片、土棉布，有的把“洋灰”袋子围在腰间当工作服。住的是茅草棚和芦席棚，有的住桥洞和屋

檐下。可是资本家及其监工、查工员、厂长、处长等高级职员，住的是甲级（A字号）、乙级（B字号）小洋楼。他们玩乐的游艺场，不让工人沾边，还专门雇了两名工人给拎球。他们的俸金比工人工资高十几倍、几十倍，到几百倍。铁厂第一任厂长吴健的月薪高达1230元。

大冶铁厂还设立了许多压迫工人的统治机构和各种维护统治的制度。最突出的有监工制，牌箱考核制、搜身制。为了严密控制工人，他们在铁厂专门建了一座“工匠门”，规定工人上班、下班必须由工匠门进出。

工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必然尖锐激烈。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工人的自发斗争达十多起。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工人在党的领导下，斗争达到了高潮。

1921年九月，汉阳铁厂翻砂工出身的李福生同志来到了大冶铁厂，在翻砂场当翻砂工。他利用工余时间经常到工人中宣传马列主义，和工人们延祥寺、桃花洞、普安寺、飞云洞、山坡上、大江边谈心，讲革命的道理，启发工人的觉悟。两个多月以后，大冶铁厂就秘密组织了六十多名工人参加的学习小组，阅读《工人周刊》、《向导》、《新青年》等进步刊物。1922年三月，工人中发展了第一批共产党员仇国生、刘愚生两个同志。并在飞云洞入党宣誓，成立了“中共大冶铁厂特别党小组”，仇国生同志担任党小组长。这是黄石地区第一个党组织，也是湖北地区最早的党组织之一。

1922年八月，汉阳铁厂工会派来了共产党员马东扬同志，并帮助大冶铁厂于十一月十八日成立了工人俱乐部。

1923年元月十三日，下陆机修厂在工人俱乐部的领导下，举行了大罢工。元月十八日，大冶铁厂举行了同情下陆工人的罢工。这次罢工在全国和本地区各厂矿工人的支援下，坚持了二十二天，取得了空前的胜利，迫使厂方在工人的条件书上签了字。

1923年五月一日，铁厂十三名共产党员，趁江北散花洲农村闹“财神会”演戏之机，在江心的木船上成立了“中共大冶铁厂特别支部”，仇国生同志任支部书记。支部还决定由共产党员刘天津同志用党费在中窑桥西头开了个小百货铺，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站。

1925年底，湖北总工会特派员李兆龙同志来大冶铁厂，工人运动又有新的起色。1926年九月，北伐军第四军到达大冶地区，并帮助大冶铁厂工会在二门外国民小学公开成立。十一月，李兆龙亲自率领工人砸掉了工匠门。

1927年元月十七日，大冶铁厂工人又举行了一次支持武汉、九江人民收回英租界的大罢工。从1923年至1927年，这里几乎每年都有1—3次罢工，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

同年二月底，港（黄石港）、窑（石灰窑）、湖（袁家湖）地区建立了工人武装纠察队，分三个中队，有六百多名队员。铁厂是一个中队，接管了资方武装马巡队和厂警队的枪弹库。有美国马八匹，长枪260多支，短枪三十多支，子弹一万六千多发。六月十日，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在一门和中窑山上跟夏斗寅独立十四师的叛匪军进行了一场激战。从早晨六点钟战斗到中午十二点才撤离。

七月二十日，港窑湖地委撤到九江待命。一部分同志后来参加了南昌起义。来不及撤离的共产党员和工人纠察队员，在夏军进厂后，大部分都惨遭杀害。从此，铁厂又被乌云笼罩，工人又陷入了被蹂躏、被践踏的泥坑。抗日战争时期，这里工人的斗争虽然没有间断，那都是发自工人内心民族仇恨的反抗力量。直到日本侵略者投降以后，武汉市委派来了共产党员张维民同志。47年春，黄石地区又发展了二十多名党员，“华钢”也有三名党员。

党的活动恢复以后，工人的革命斗争又如潮涌。47年十二月六日，“华钢”工人在党的领导下，又举行了一次大罢工，这是一场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

1948年底，党又领导了黎明前的护厂斗争，成立了“护厂委员会”。终于取得了胜利，迎来了工人阶级的解放。

我参加中国驻印军的一段经历

朱 和 甫

一、前 言

一九四四年春，当时我在国民党军队一一军政部学兵总队高射机关枪营任第三连连长，部队派驻云南省会昆明市郊区黑林铺，担负由美国军人主办的步兵训练所的警戒及战术示范部队任务。突然接到总队来的命令，把我们营全部官兵编入总队所属的炮兵第二团，即随该团赴印度配合英美盟军对日作战。于是部队立即交卸了原来任务，待命出国。

二、出国前的风波

几个美国军医带领着一批中国的军医人员来到了部队，对全体官兵进行体检，按他们规定的身长体重标准以定去留。先由中国军医检查，合格者就在臂上印上一个老大的兰色戳记“PASS”然后再由美国军医验收，让他们相上一下，认为不合意的摇摇头就剔除，认为合意的点点头，于是在臂上再印上一个老大的红色戳记“PASS”，凭这两个红兰戳记，就算合乎标准登记造册，并宣布这两个戳记在启程前不准擦掉，留待上飞机时作为凭证。这种作法和收购牲畜有什么两样？简直是对人的尊严和人格的

莫大侮辱！面对此情此景，我们实在按捺不住心头怒火，岂能老实就范，任人摆布，军官们拒绝体检“老子们不是牲口，父母清白遗体，决不能任人玷污！”“打日本人国内有的是，为什么到外国去？替洋鬼子打那门子仗？”面对我们的抗议，大官们慌了手脚，急忙到洋人那里去商量，果然生效，很快下了一道命令：所有军官一律免于体检，均须带队出国，有擅离部队拒命不去者，作敌前脱逃，军法制裁！结果我们营四个连长，三个有家属的都没有去，事后并未受什么军法制裁，看来那道严命也不过只是一张吓唬人的空头支票。

三、空运出国

昆明是一个四季如春的美丽城市，远离抗日前线，虽然也经过日机的几次轰炸，但并未遇到严重的破坏，仍然保持着它的妩媚和安谧，如今我们就要向它告别了，还真有点恋恋不舍。临行的一天，是一个春光明媚的晴朗天气，我们这批出国官兵乘大卡车到了飞机场，这里没有花束和欢送的人群；见到的是四周站着荷枪实弹的宪兵，戒备森严；总算点缀着几位为我们送行的老同事，默默的握着手道声珍重而已。所有出国官兵，除一身单衣外，更无长物。一行行的走向指定飞机，没有人讲话，这种情景哪象是舍身报国的健儿走上征途？倒象一群被押解的俘虏；我抱着此去吉凶未卜的心情，在启程前已把私人财物分赠友好，连钢笔挂表也未留下，临上飞机前发现还穿着一双皮鞋，立即毫不犹豫的脱下来，和送行人中换了一双旧布鞋，跨上了美军的C-46型运输机。这种飞机原本是运货

的，舱内没有坐位，当兵的一个挨一个坐在坚硬的舱底上，我也是第一次乘坐飞机，在四十年代象我们这些不起眼的人坐上飞机，真算开洋荤呢！四个多小时的航程，它载着我们越过了世界屋脊的喜马拉雅山，飞出了国境，到了目的地——印度兰姆加。可是在这两百多分钟的短促时间里，却使我们经受了严寒酷暑的考验，刚才还冻得嘴唇发青、索索发抖，落地后又象在蒸笼里，舷梯上的金属栏杆烫的手不敢扶，这里正是日夜气温在40度以上的炎热夏季，它好象故意给我们这群温带来客一个下马威，我脑子昏昏糊糊的，仿佛眼前这一切都不是真的，只几个小时之间，我已身在异国，遥望北天，祖国、亲人已远隔万里，还有没有重见之日？

四、中华民国驻印军

我们这个团抵达印度后即改了番号，称为“中华民国驻印军重迫击炮第十二团”配备以105重迫击炮，这种炮在国内时我们曾学过，所不同的无非是取消了马驮人背，而代之以汽车运送，而形成了部队的半机械化，减轻了士兵们的劳力负担。

从当时所谓盟军指挥系统来说，这里是隶属东南亚战区，司令官是英国人蒙巴顿勋爵，下属印缅地区设立了一个指挥部，指挥官是美国人史迪威将军，这个区域内有中英美三国军队共同对日作战，专门负责中国部队的有个副指挥部，指挥官是郑洞国将军，部队一律定名为中华民国驻印军，下辖新一、新六两个军，有七个战车营，也设立了一个指挥机构，蒋介石的二儿子蒋纬国就在这个机构内

当参谋，据说这位蒋二公子的任务是长期居住在印度的最繁华的城市——加尔各答，负责接收外国装备，他本人和战争不发生直接关系，真是一个既安全而又欣乐的职务。还有两个榴弹炮团、两个重迫炮团、两个工兵团、五个辎汽团以及通信兵团等，共约十多万人。这是印缅战场上盟军中的主要战斗力量，担负着主要的和艰辛的战斗重担。这支部队的后勤补给，全部操纵在美国人的手里，给养和服装以及生活用物，是由英国人供应，和它们的殖民地部队相同，享受不到美国军队那种优越的物质条件；武器和军车装备由美国供应，但和他们部队也是有差别的；至于这三个国家军队官兵薪饷待遇，那却是各具标准，诸如一个美国兵，月薪最低四十美元；而一个中国的少校军官月薪是一百五十卢比（印币），都是约半两黄金的代价，所以在一个战场上战斗的盟军，由于国家的强弱贫富，人的价值也就大有不同了。

美国人为了有效的控制中国部队，在中国部队中配备了美军联络组，凡属特种兵连以上、步兵营以上单位，均派联络官一人，他们的军衔比所在部队长低一级，任务是直接传达指挥部下达的一切命令和指示、监督执行、向上汇报部队情况、部队补给等事，表面上看，他们似乎无权直接指挥部队官兵，但实际上，他们却直接操纵着各级部队长，这些人才是“中华民国驻印军”真正的指挥官。

五、兰姆加的三个月

印度北部阿萨密省的一个镇市——兰姆加，是中国军队来印度后的整训基地，当时战事在缅甸境内进行，这里

丝毫受不到侵扰，中国军队到这里后，都必须先整训三个月，然后再编入战斗序列，接受战争任务。其整训目的无非两项：一，中国士兵在国内时生活艰苦，长期营养不良，大多体质孱弱，到这里后大米虽然粗糙，却可不定量的尽吃，而且菜蔬方面，每天还配有牛肉、咸鱼及其他荤食罐头，这样养上几个月，确能增强体质，有利战斗。二，一切科目均由美国教官任教，让中国官兵都当学员来熟悉一切即将使用的美式武器和装备，并把战斗动作统一到美式的战术要求中来，其实，他们教的那一套，也并没有什么新鲜玩意，我们部队老兵多，都屡经整训，也有些实战经验，因之，这些就无须他们多操心了。我们居住的兵营很陈旧，但却构筑结实，四周有深沟高垒，还围有能通电流的铁丝网，确觉安全可靠，但总使人感到这种营房构筑形式特殊，不同一般，经打听后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房子最初的主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俘，它是一战俘集中营。而如今，专为照顾中国军队又用上了。我们在里面整整住了三个月，在此期中，每日进行着繁忙的练兵，课堂、演习场都设在野外，各种科目都有预先选好的场地，近者步行、远者车运，而且风雨无阻，坚持执行，从无更改，这种精神倒是值得效法的。印度的夏季是酷热的，为了生物能以生存，大自然却作了巧妙的安排，尽管看来骄阳似火、万里晴空，却会突然飞来一片乌云，顿时大雨倾盆，淋得睁不开眼睛，使全身因而凉爽，感到片时的快意，每天总有这么几场及时雨，这就是“雨季”称呼的来源，这种奇特的气候特征，在我们国家是没有的，因之许多人对此不能适应，发生感冒和疟疾症，为此，卫